

臺灣社會學刊 第十九期
1996年3月 頁169 - 211

現代性的省察 ——歷史社會學的一種詮釋

黃瑞祺*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文摘要

本文認為「現代性」具有特定的時空屬性，可以簡單說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特性」。「現代性」在個人層次而言指一種感覺、思惟、態度及行爲的方式（所謂「個人現代性」），在結構層次而言則是指社會制度、組織、文化以及世界秩序的一種特性。所以從歷史上來說，「現代性」是一種新的全貌（new constellation），包括生活中的重要層面，而以「西方理性」為其核心，其歷史發展和內涵要素本文將會有所論述。

本文將「現代性」視為起源於歐洲中古末期，在歐洲近代史上逐步發展，且隨著歐洲勢力的擴張而傳播到全球。所以本文一方面從歐洲近代有關的重大事件追溯現代性的形成及性格，這我稱之為「西方現代性」的階段，主要是在西歐、北美的範圍發展；另一方面檢視西方現代性隨著西方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而傳播的過程，這我稱之為「全球現代性」的階段，此階段一方面代表現代性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則顯示全球性及全球化已發展成為今日之現代性的顯著面向了。這是現代性高度發展的時期。由於全球化的發展，全球已經形成了某種的體系或秩序了。到目前為止，這已經是一個「現代世界」了，此現代世界的形成過程即現代化。全球化也是現代化的一部分。絕大多數的國家或地區都自願地或被迫地整合到此「現代世界秩序」中，此整合到「現代世界」的過程也就是各個地區和國家現代化的過程。所以現代世界基本上乃由西方強權所形塑及主導的秩序。

本文用一個漩渦模型來闡明現代性及現代化。「現代性的漩渦」最早發源於歐洲，由於現代性的積累、擴張的特質（和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的性質相對應）以及歐洲人的活動，此漩渦越捲越大，先是波及非洲、美洲，繼而波及印度、東南亞、中國、日本，終於席捲全世界。所以現代性的形成不但關係著近代西方的興起，也形塑了西方和非西方之間的關係，乃至影響了非西方世界的發展和命運。

關鍵字：現代性、現代化、西方理性、全球現代性、漩渦模型、現代世界

引言

爲什麼還要談現代性和現代化？五十年代就開始流行的「現代化理論」不是早已討論過這方面的問題嗎？當時現代化理論從美國流行到第三世界，在美國是社會科學界的熱門題目；在第三世界「現代化」則成爲知識份子及政府官員的口頭禪。連中共也抓著現代化流行的尾巴，在七十年代後期，開始推行「四個現代化」，試圖「超英趕美」，已經成爲家喻戶曉的政策了。當時這股歷久不衰的現代化熱潮，一方面，固然由於有學術理論（例如現代化理論、經濟發展理論、結構功能論等）在推波助瀾；另一方面，也由於有美國霸權對第三世界的影響力在支撐著，此霸權原先主要是透過美援、軍援以及CIA的活動在運作，其後則是透過軍售及貿易制裁，不過影響力已大減。一旦美國霸權衰退，現代化理論也隨之沒落了。（註1）不過「現代性」和「現代化」的概念仍然有其價值。現代性的形成及發展、近代西方的興起、以及現代世界的形塑三者有密切的關聯，雖然時間大略有先後之別，所以在本文，現代性的形塑可追溯到歐洲中古末期（十一世紀）義大利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復興，近代西方的興起則大約是在十五世紀下半葉（1450-1500），其後四、五個世紀由歐美列強主導著現代世界（體系）的形塑。所以現代性的形成不但關係著近代西方的興起，也形塑了西方和非西方之間的關係，以至影響了非西方世界的發展和命運。所以，今日作爲一個東方人、中國人、台灣人（不管他或她的政治立場如何），要瞭解我們近代的遭遇，必須瞭解近代西方，我們之所以成爲今日之我們，和近代西方息息相關；而要瞭解近代西方，必須瞭解現代性，西方之所以成爲今日之西方，主要拜現代性之賜。（註2）

「現代性」一詞似乎蘊涵某種的普世性（在空間上的），或者普世的演化論，意即全世界不論是東方或西方都將朝「現代性」演化，甚至有人賦予此詞某種的（普世）規範性。本文作者認為「現代性」其實具有特定的時空屬性，可以簡單說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特性」。本文講的「現代性」在個人層次而言指一種感覺、思惟、態度及行爲的方式（所謂「個人現代性」），在結構層次而言則是指社會制度、組織、文化以及世界秩序的一種特性。所以從歷史上來說，「現代性」是一種新的全貌 (new constellation)，包括生活中的重要層面，其歷史發展和內涵要素後文將會有所指陳。

現代性首先發源於南歐（意大利北部），現代性在歐洲（主要是義、荷、英、法、西、葡、德等國）發展傳播的過程，就是歐洲的「現代化」。與此同時，歐洲列強的勢力向世界其他地區擴展，主導著「現代世界」的形成和發展，成為現代世界的主宰。西方現代性也伴隨著西方軍事、政治、經濟等勢力的擴張（尤其是殖民主義），而向非西方地區傳播。此一過程顯然就是「西化」。稱之為「現代化」比較容易引起誤解和爭議，好像說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只能是「現代的西方」。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未來在範圍上可能可以超越「西化」，這還要看非西方未來的創造力及努力而定。不過就目前為止而言，非西方的現代化大體上就是西化。甚至在有些地區現代化是採取殖民化的形式，如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現代化最早可說是由殖民者來推動的。（註3）

本文試圖從歷史社會學的宏觀角度對「現代性」提出一個兼具歷史性及全球性的詮釋，這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西方現代性」，指陳「現代性」從中古末期以降，在歐洲的形成和發展

的軌跡；另一部分則是「全球現代性」，論陳「現代性」晚近的發展趨勢，即全球性和全球化。本文作者並非歷史學者，文中援引一些一般性的史實（尤其是西洋史的），主要目的在於闡明「現代性」的意義，而「現代性」實為社會學及社會科學的重要概念。本文另一特色就是比較概要性 (programmatic)，這是因為本文嚐試採取的策略是先描述或凸顯整個問題的輪廓，以後若再作後續研究，可以專心處理一些細節的問題。因此有關的細節問題無法在本文中一一加以縷析。

1. 歐洲的興起和擴張

近代歐洲勢力的興起與擴張大約始於 1500 年左右，也就是歐洲人開始海外探險或探航的活動。從 1500 年到工業革命是歐洲擴張的第一階段，一方面探索往東方的航路以及佔領殖民地，另一方面從事香料、茶葉、咖啡、糖、煙草、奴隸等的殖民地貿易；工業革命開始以後，殖民地變成工業國提供原料和糧食的產地，以及工業產品的市場，同時又是歐洲移民的目標。

加拿大裔的美國史學家麥克尼爾 (William McNeill) 主張西方或歐洲自從 1500 年之後就躍居世界的霸主 (McNeill, 1965: 619)，後來他也承認 1000 ~ 1500 年中國則是最為都市化、工商最發達、技術最進步的國家，曾造成世界性的影響，成為當時世界的中心（引自邢義田，民 76: 487-508）。英國社會學者麥可曼 (Michael Mann) 則斷言「歐洲超越亞洲的時間點必定是在 1450 年左右，亦即歐洲海權擴張及伽利略科學革命之時」（Mann, 1988: 7，引自 Stuart Hall, 1992: 281）。二者指出的時間差不多，正是歐洲勢力擴張之始，海權擴張導至新航路和新大陸的發現，或所謂

「地理大發現」，意即歐洲的探險家發現或航抵世界其它五大洲，對於歐洲人而言這等於是發現「新世界」。

近代歐洲能成爲世界霸主，主要是由於征服了海洋（遠洋航行），首先成爲海上霸主，然後從海上包圍及進攻舊大陸（歐亞大陸），使得過去的世界霸主如阿拉伯、印度及中國等不得不俯首稱臣。地理大發現的航行有賴於造船及航海技術的發展、羅盤的使用以及地圓說的確立，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有敢於冒險的勇氣，因爲遠洋探險是在未知的廣大領域探索，失敗的代價常常是賠上（一群人的）性命。（註4）

地理大發現的結果大大增進了西方人的地理知識和對其它民族的社會文化的瞭解，對西方人的現代世界觀影響極大。地理大發現進一步也導致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以及爭奪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戰爭，即所謂的「世界大戰」（其實主角或受益者還是西方列強）。麥可曼上面提到的另一歷史事件是十六、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主要是在天文學、物理學等方面，不僅是麥氏所提到的伽利略的科學成就，哥白尼、開普勒，牛頓等的理論都是科學史上的里程碑。科學革命不僅影響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也影響到工業革命。而啓蒙運動對於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啓發也相當顯著，例如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的主張成爲美國憲法的理論根據。這些歷史事件及運動形塑了西方現代性，後文將會分別加以論析。

2. 現代性和現代化的意義

如上所述，「現代性」簡單講就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特性。現代性的全幅意義必須從兩方面來觀照：一方面是從歐洲現代史上

來瞭解現代性的根源、發展、及性質，亦即把現代性放回到歐洲歷史的脈絡中來瞭解，這是從（西方）歷史的觀點來探究現代性；由此，我們並不是要建立起一個模式或規律，從而方便於把西方的現代性推行到其它地區去，像現代化理論所倡導的那樣。我們首先想要瞭解西方社會如何成爲今日之西方社會。

另一方面，雖然現代性是起源於歐洲，透過歐洲人的活動，諸如海外探險、傳教、海外貿易、殖民等等，西方現代性已傳播到全世界，同時西方國家也主導了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西方現代性從而有了世界史的意義。而且更重要的是現代性傳播到全世界之後產生了新的面向——即全球性 (globality) 及全球化 (globalization)。現代性在目前而言只有在「現代世界」(modern world) 的範圍才能充分展現；在「現代諸社會」(modern societies) 裡，即使是歐美社會，也不能完全表現現代性。所以今天必須從全球的觀點來探究現代性。如上所述，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現代世界形成了一個諸社會密切互動的體系，而且此互動發生在各個層面，諸如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等，頻繁的外交活動發生在諸社會或國家之間，傳播媒體早已超越了諸社會或國家的界線了。以上提到的一些概念下文將會分別加以解釋。

上述兩方面或兩個觀點隱約形成現代性發展的不同階段。前者主要是現代性從歐洲中古末期以來直到二十世紀初的發展，這是比較早期的階段，也可稱之爲「西方現代性」(western modernity) 的階段，因爲主要是在西方或歐洲的範圍發展的。從本世紀初以來則是現代性進一步發展的階段，現代性有了新的特質——主要是全球性及全球化——可稱之爲「全球現代性」(global modernity) 的階段。

下文將分別從上述兩方面或兩個階段來探究現代性及現代化

的意義。

2.1. 西方現代性的形成及發展

歐洲中古末期以降，一些歷史事件或運動共同形塑了西方現代性，對考察現代性深具意義；作者不是歷史學者，在此並非要作歷史考證，也無法在本文有限的篇幅裡詳述其來龍去脈，只能略述其大意，點出其與現代性相關者。問題不在於下述之一般性史實本身，如果能夠藉這些點顯示出西方現代性發展的歷史軌跡，則已達到本文的目的了。因為本文的目的是在闡明西方現代性。

2.1.1. 歐洲中古後期（11～13世紀）城市的復興

當時的城市通常都具有城牆、市民自由選舉並經過上層批准的市議會、市場、大學等設施，在經濟上依賴周邊農業地區的農作物維生，當時的城市主要是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居留地。(Sombart, 1991: 86-126) 這些工商業人士日益增多，後來就形成一個新的階級，普通稱為「中產階級」(Middle Class)。中產階級的興起，使中古歐洲社會經濟的結構發生基本上的變化，後來歐洲歷史上許多的變遷都與中等階級的新要求有關。中古城市可說是西方資本主義及工業革命的發祥地。一般而言，城市乃現代性經驗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的搖籃，現代經驗概指迅速變遷、稍縱即逝、瓦解、迷失、矛盾、弔詭等時、空、物的經驗，這些都是在都市生活中孕育出來的，也是在都市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Berman, 1990: 13-171)。

2.1.2. 文藝復興運動

十一世紀末歐洲的十字軍東征雖然在軍事上可說完全失敗，但在文化（交流）上有很大的收穫。許多歐洲人到回教區域去研究，他們將許多回教徒的學術著作翻譯過去，提高了歐洲學術的水準。再加上我國發明的造紙術和印刷術也經由回教徒傳入歐洲，促使歐洲文化、教育發達。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影響歐洲在十四、五世紀間產生文藝復興。當時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如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等，由於位居東西世界貿易的轉口站，而繁榮興盛。由於商人階級的鼓勵和贊助，文藝活動盛行。當時整個文化取向 (cultural orientation) 有一個大轉變，即對希臘羅馬古文化的興趣抬頭，宗教文化轉變為世俗性的文化，主要的興趣是文藝，而非神學。換言之，就是世俗化及平民化。當時發展出「人文主義」的文化理想，認為他們的文化和教育的目標在訓練有智慧、善於表達的人，反對中古教育中某些職業訓練如神學、醫學、法律等，而鼓吹人文教育，即以倫理、哲學、音樂和修辭學為主。這些都對歐洲現代文化的發展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2.1.3. 海外探險及殖民主義

如上所述，近代西方之所以能主宰世界，是因為征服了海洋，即勇於向未知的大海探索，最後發現了新航路及新大陸。十字軍東征期間，中國人發明的羅盤經回教徒之手傳往歐洲。有了羅盤之後，他們才可能從事遠洋的探險。在歐洲國家中，葡萄牙和西班牙最先向海外發展，想尋求金銀財富及對外貿易。葡萄牙在十五世紀初就已經開始向大西洋和非洲西岸探索。經過七、八十年的努力，葡萄牙人在西非海岸建立了不少據點，從而獲得不

少利益，如象牙、黃金以及奴隸。1488年迪亞士(B. Dias)航抵非洲最南端的風暴角（因繞過此處獲取印度財富在望，葡王將其改名為「好望角」），完成了歐洲探航史上的重要歷程。達伽馬(V. da Gama)沿著迪亞士航行的路線，從非洲西岸繞道好望角，到達蘇丹，再從蘇丹駛抵印度(1497 ~ 1498)。迪亞士和達伽馬的探航是歐洲向海洋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對爾後東西方關係及勢力消長有重大的影響。

在十年之內，葡萄牙建立了一個海權及商業帝國的基礎(Stuart Hall, 1992: 283)。這條航路後來延伸到中國的廣東(1514)，甚至到達日本(1542)。葡萄牙人既然開創了新航路，遂得以壟斷由東方（中國、蘇門答臘、印度）直接由海路抵達歐洲的商務活動。他們在印度、麻六甲、澳門乃至於日本建立商業據點，與當地人進行貿易，獲得極大利益。當時中國政權尚能有效地抵抗西方勢力的入侵。

西班牙人此時亦不甘落後。西班牙統治集團在十五世紀末全國統一後，積極支持海外探航，在這方面最重大的收穫就是哥倫布橫渡大西洋，到達美洲。當時相信地圓說的人認為：如果由歐洲向西航行，應可到達東方。這個信念終於由西班牙國王所資助的哥倫布所實踐。他於1492年橫渡大西洋，抵達現在的西印度群島，後來又發現了南美洲和中美洲諸地。值得注意的是，哥倫布是在尋找通往東方的航路中意外地發現美洲的。但終其一生，他都以為他所發現的地方是亞洲的邊緣。歐洲人發現美洲新大陸對於歐洲勢力的擴張以及東西方勢力的消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1519年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得到西班牙國王的支持，橫渡大西洋，進行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的全球航行，象徵著歐洲人征服了海洋。

荷蘭和英國是繼葡萄牙、西班牙之後的海權國，四國的探航活動最後在東南亞海域交會。葡萄牙佔據澳門(1557)、西班牙佔領馬尼拉及菲律賓群島(1570)、荷蘭佔有台灣(1624 ~ 1662)、以及英國奪得香港(1842)，作為遠東貿易的據點，繼而開拓殖民地。從十六到十九世紀，歐洲各主要國家均以發展海外殖民地為其要務。而他們之所以能予取予求，除了被殖民地原有社會文化情況之外，歐洲人在造船、航海、槍炮等技術方面的進步亦是一大主因。這和歐洲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以及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都有密切的關係。

歐洲人的地理大發現對近代世界史影響重大，它改變了世界各大陸和各大洋之間隔閡孤立的狀態，加強世界各地的聯繫，促進世界市場和世界體系的形成。同時也讓西方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獲得重大的發展。

2.1.4. 資本主義

關於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方式是何時產生的問題，眾說紛紜，在此不擬一一加以評議。簡言之，差不多到了十四和十五世紀，這種生產方式在地中海區域已經出現了（黃仁宇，民八十：68）。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特徵為：資本為私人（即資本家）所擁有；資本家雇用自由勞動者從事生產。在這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資本」，但是資本究竟是甚麼呢？這也是眾說紛紜的問題。有人說：資本就是能不斷自行增值的一種價值（Marx, 1976: 247-280），或者是可以用來不斷自行擴張或積累的財富（Wallerstein, 1983: 14）。資本的擴張或積累是沒有限度的，資本家的活動也是無休止的謀取利潤（馬克思，1975: 174-5）。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裡，有兩個主要階級：資本家和工人，資本家擁有資本，

工人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依馬克思之意，資本若要繼續積累，必須佔有工人勞動的剩餘價值。

資本主義是瞭解西方現代性十分關鍵的一個要素，資本主義這種無休止的擴張或累積的性格形成了現代西方文明的一個特徵。近代西方國家不斷向外擴張，尋找市場、原料、廉價勞力、及金銀財寶等，構成了上述十五世紀以降在海外探險、拓殖、劫掠、貿易等方面的活動，馬克思稱之為「原始積累」。歐洲向外擴張雖然直接表現在新大陸和新航路的發現上，但也有賴於資本主義的積累及擴張在支撐，否則就會像無源之水，其枯竭可立而待也。這也是為什麼其它地區雖然也有遠洋航行或探險（例如明朝鄭和曾航行到非洲東岸），卻不能從事殖民或其它經營。

依照馬克思的說法，資本主義一旦確立之後，主要是進行「資本主義積累」，即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剝削剩餘價值也有兩種途徑，其一是增加工作時間或壓低工資，這是「絕對剩餘價值」；其次是提高勞動生產力或改進生產方法，這是「相對剩餘價值」。前者是工業化早期常用的方法，所以造成工人的悲慘境遇；後者（相對剩餘價值）則是其後所沿用的主要方法，可有很大的空間，以加速資本的累積，同時也是推動科技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馬克思，1975）

2.1.5. 宗教改革

基督教發展到十六世紀初，腐化嚴重，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是販賣赦罪券 (indulgence) 以搜刮民財、徵收十一稅，以及買賣教職等，於是出現改革的呼聲。路德本人早年原是一個依照教會的傳統潛心苦修的教士，有一天他在研讀聖經時看到「義人必因信得生」時，突然覺悟到原來人的得救，只是因為他對神的信仰以

及神的恩賜，其他一切外在的善行、懺悔並不能保證使人得救。有了這樣的信念之後，路德於1517年萬聖節發表〈九十五條論綱〉，攻擊當時教會出售赦罪券，連帶地也否定了教會和教宗的權威，只承認聖經的權威，教宗宣布把路德逐出教會。宗教改革於焉開始，基督新教遂告誕生了。

在路德的追隨者中，喀爾文的影響很大。他把新教的主張組織成一個清晰完整的神學系統，其基本信念是：人的得救與否完全是神預先設定的，人無法藉善行或懺悔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但這並不是一種放棄行動的宿命論，相反地，虔誠的信仰與完美的德行是每一個即將得救的基督徒的義務，這些人是上帝的選民，應該爲了榮耀神而努力，在世間努力工作。喀爾文教義受到許多工商業者歡迎，因爲他們從此可以安心地一面追求世間的成就與財富，一面仍不失爲虔誠的教徒，將在世間所得的看作是榮耀上帝的禮物。

韋伯也認爲喀爾文教義的俗世制欲的精神和資本主義有密切關係。依據韋伯的說法，西方的宗教改革和現代性的關係密切，因爲新教（尤其是喀爾文教派）的俗世制欲的教義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之間有內在的聯繫，新教徒幫助促進現代資本主義的建立，從而推動現代社會的形成。(Weber, 1958)

宗教改革之後，歐洲經歷了近一百年的戰亂（十六世紀中至十七世紀中），都和宗教派別的爭執有關。宗教戰爭促成了歐洲民族主義的興起，此後各國之間的外交往來逐漸具有現代的雛形，只談國家民族利益關係而不論宗教信仰。而且在宗教戰爭結束之後，歐洲各國才真正開始在宗教方面採取寬容的政策。可以說宗教改革之後，歐洲不論在宗教上還是在政治上都趨向於多元化。

歐洲文藝復興代表歐洲人對世俗文化的肯定和對個人精神獨立的鼓勵。這兩種精神和新教改革的精神很接近。新教要每一個人單獨面對上帝，正是一種個人主義的精神；而喀爾文派主張以世俗的成就來榮耀上帝，也承襲了文藝復興時代肯定世俗生活的精神。

2.1.6. 民族國家

歐洲古代及中古的國家型態主要是大帝國，近代才有一個民族建立一個國家的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的體制，這是近代歐洲主要的國家型態，隨著歐洲勢力的擴張，民族國家的型態也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尤其是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再者，歐洲中古時代一般人原無民族思想，只有地方觀念。自從十字軍東征以後，歐洲人與外界接觸，始逐漸產生民族意識。再加上我國發明的火藥傳往歐洲，原來無權的歐洲各國國王，就憑藉著火藥大砲，攻打依據堡壘割據自雄的封建諸侯，而將國家統一起來。十五世紀以後，歐洲興起許多民族國家，如英、法、西、葡、俄、丹等，其國王對內都竭力鎮壓原有的封建諸侯，王權日益提高。王權提高就形成專制政治，歐洲專制政治在十七世紀間發展到最高峰。不過本文在此強調的是歐洲民族國家的建立，這是現代的政治單位，擁有國家主權以及確定的疆域和人民。

2.1.7. 民主革命

西方近代的民主革命主要有三：英國的光榮革命、美國獨立以及法國大革命，三大革命奠下西方民主的基礎。這其中除了「主權在民」的基本理念之外，還包括「法治」(rule of law) 的要素。下面就其有關的一般性史實作一回顧，以期對政治現代性的要素

——民主法治的形塑有點概念。

西元一六八五年英國國王詹姆士二世即位後，積極恢復舊教和專制統治，致使人心大憤。國會中王黨 (Tory) 與民黨 (Whig) 兩派議員決定聯合驅逐詹姆士二世，並於一六八八年派人迎接出嫁在荷蘭的詹姆士二世之女瑪麗 (Mary) 及其夫婿威廉為英王。當瑪麗和威廉抵達英國時，全國軍民熱烈歡迎，詹姆士二世被迫逃亡，威廉順利即位，稱為威廉三世。這次革命因未流血，所以稱為「光榮革命」 (Glorious Revolution)。威廉三世既因國會擁戴而即王位，即位後就都聽從國會的主張。國會在一六八九年通過權利法案 (Bill of Rights)，經威廉三世簽字遵守。其中規定：1. 國王未經國會同意不得徵稅募兵；2. 議員在國會中享有言論自由；3. 國王不得否決國會通過的法律和法案等。從此以後英國專制王權結束，國會成為最高的立法機構，掌握了國家最高的統治權。從此奠下了英國民主政治的基石。

一七七六年美國宣布獨立後，事實上尚無統一由政府，由臨時主持軍政事務的大陸會議草擬一憲章，即邦聯條例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後經各州議會的批准，組成邦聯政府。但是獨立戰爭結束後，各州均欲保持獨立自主權，邦聯政府幾乎瓦解。一七八七年各州重派代表，另訂新憲法：採取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學說，立法權由國會執掌，司法權由各級法院執掌，行政權由每四年改選一次的總統執掌，這是近代第一部根據民主學說制定的成文憲法。民主法治的規模具備。後來根據憲法舉行大選，華盛頓當選為首屆總統，組織聯邦政府，建立近代第一個民主的政府。

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乃西方另一次的民主革命，對後世影響很大。從法國大革命可以看到歐洲中古到近代的變革。中古

歐洲的貴族和教士佔有大部分土地，享受許多特權。這種情形至十八世紀還沒有多大改變。以法國而言，貴族和教士雖然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卻擁有全國耕地面積的五分之二，且不納稅。而佔人口最多的農民，卻要負擔國家大部分的稅收，且需按照封建的遺規，向貴族和教士獻納。再加上國王十分專制，政府可以隨意拘捕人民，貴族生活奢靡，這些不公平和腐敗的現象，就是有識之士急思改革的目標。這是法國大革命的主要背景。

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導火線在財政問題。原來十七、八世紀法國參加過多次國際戰爭，政府負債累累，迫得國王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希望藉此來解決財政的困難。一七八九年五月貴族代表三百人、教士代表三百人和平民代表六百人集會時，平民代表因受當時美國制憲的影響，不僅要求將三級會議改為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而且還要制定限制王權的憲法。路易十六迫於無奈，只得答應平民代表的要求，將三級會議改為國民會議。路易十六爲了預防平民代表過激行動起見，暗中調動軍隊向巴黎集中。這一消息傳出後，巴黎民衆起來暴動，殺害市長，驅逐官吏，並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攻破巴士底(Bastille)監獄，成立民選的市政府，招募四萬多人組織國民軍(National Guard)，準備以武力來支持平民代表。

巴黎暴動的消息傳出後，法國各地的人民也紛紛起來驅逐王室委派的官吏，組織自治政府、成立國民軍等；過去法國的專制體系完全瓦解，政權落入國民會議手中。國民會議掌權後曾經推動如下的改革：廢除封建制度，取消貴族的封號、特權；發表人權宣言，保障人民自由、平等諸權力；沒收教會財產；制定憲法等。國民會議制定的憲法本來規定採取君主立憲，仍奉路易十六爲國王，但後來由於普、奧兩國反對法國革命，組織聯軍進攻法國；再加上路易

十六和他的王后秘密與奧國聯絡，而且企圖逃亡，因此到了一七九二年召開的新國會——國民公會 (National Convention)，就宣布改國體為共和，並以通敵的罪名將路易十六處死。

法國大革命所提出的理想——自由、平等、博愛，以及推翻君主專制成立民主共和政體，是政治體制上的重要變革。民主法治的思想及制度為西方現代性的重要特徵，和上述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有密切關係，基本上代表中產階級取代了貴族和僧侶，獲得了主導權。再者，由上述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可知，在民主政治建立的過程，常需要使用暴力，以排除障礙。暴力的使用乃民主化及現代化過程的一部分。

一九八九年東歐變革之後，民主在東歐地區盛行一時。在那之前，民主在東亞（主要是韓國、台灣）也獲得了進展，使得民主在九〇年代又再度成為世界風潮，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稱之為「第三波民主」。(Huntington, 1991)

近來有些學者提出「全球民主」(cosmopolitan democracy) 或「國際民主」(international democracy) 的觀念。「全球民主」或「國際民主」簡言之即「國家之間的民主」(democracy among states)，而非「一國之內的民主」(domestic democracy)。他們企圖把傳統自由民主的模型推廣到全球或國際的層次上，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Held, 1993: 13-52; 1995: 1-16)

2.1.8. 科學革命

現代人物質生活的改變主要是根源於西方科學的進展，由科學發展出來的工藝技術 (technology) 應用到物質生產中，即成為現代的工業，提供現代人物質生活之所需；現代人的世界觀及宇宙觀也受到現代科學很大的影響，有些部分甚至是科學所建構起來

的；科技所造成的負面後果（例如核戰威脅及環境污染）也成爲現代生活的一部分。科學成爲現代性不可或缺的一環。在西方科學的發展上，十七世紀是一段重要時期，史稱「科學革命」。討論西方現代性，不得不討論十七世紀的科學和科學革命。以下非常簡略地回顧一下十七世紀天文學和物理學上幾件重大的事件。

一直到十七世紀爲止，大部分歐洲人對宇宙的觀念，是由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托勒密的天文學和基督教的神學所混合而成的東西。根據此觀念，地球爲宇宙的中心，其它星球圍繞地球作圓形運動。在其它領域如生物和化學方面，當時也有一些類似的假設，如世界是上帝創造的，萬物均在一種和諧的秩序之中。這些理論都相當依賴過去的權威，墨守成規。當時歐洲人還缺少一種憑藉人的理性來瞭解世界的態度與信心。一直到十七世紀才有比較大的改變。

哥白尼 (N. Copernicus) 認爲托勒密體系一個最嚴重的缺陷就是太過複雜。根據托勒密的計算，所有的天體大約固定在八十多個互相牽連的球形軌道上繞地球旋轉，同時還有許多不規則的運行。哥白尼卻相信，上帝所造的宇宙，應該要比這個模式簡單而和諧多了。他的大發現是：若太陽是宇宙的中心，許多在托勒密體系中的不規則情況都可以迎刃而解。不過哥白尼並無法證明地球繞日的假設，而且他的模式也還不能真正解釋所有的天體運行，因爲他相信天體運行的軌道一定是正圓形的。

在哥白尼去世約半世紀後，另一位天文學家開卜勒 (J. Kepler) 終於利用更精確的觀察和計算，證明了太陽中心說的正確性。不過他所算出的星球運行軌道是橢圓，而非正圓，這橢圓軌道正好解釋了一些天體運行的「不規則」現象。這麼一來，所有的天體運行都可以用簡單的數學公式來表示。於是哥白尼的想法獲得證實。

和開卜勒同時代的伽立略 (G. Galilei) 在力學方面有很大突破。他靠精確的實驗方法，發現了「靜者恒靜，動者恒動」的慣性現象，以及自由落體的性質。牛頓則綜合了開卜勒和伽立略的理論，加上他自己的創見，而導出他的三大運動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並組織成一套相當完備的數學系統。從此以後，一切物體的運動都可以用數學公式來描述，遂成爲所有物理學家的基本信條。

在這些天文學和物理學的發展影響下，當時歐洲人傾向於把宇宙當作一部龐大的機器，人可以觀察或用實驗法研究它的運行規律，並且以數學語言把這些規律表達出來。先是提出假設，再以觀察或假設檢驗之。簡言之，這一套探測自然的方法即「現代」科學的方法。

2.1.9. 啓蒙運動

由於受到十七世紀之科學革命及「新科學」的啓發，啓蒙思想家對人類的「理性」抱著很高的期望，透過理性的運用，自然科學已有突破性的發展，他們認爲理性應該也可運用到社會、道德等方面。這種理性迄今表現在科學及技術方面最爲顯著，意圖有系統地、有程序地去理解、預測及控制自然。科學知識是一種比較能累積的知識，從科學史上可以看到連續和累積的軌跡，如上述從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到牛頓的成就。

再者，自然科學運用到日常生活上來，產生了工藝技術和工業 (industry)，使物質生活獲得不斷的改善。所以從十八世紀以來，「進步論」成爲一種甚爲流行的思想，例如：聖西門 (Saint-Simon, 1760-1825) 和孔德 (Auguste Comte, 1798-1857) 的人類發展三階段說：神學的、形而上學的，以及實証科學的；馬克思的社會階段論也是以生產力或科技爲根據的一種進步論。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主張人類社會是從強迫協調的軍事社會演進到自願合作的工業社會；甚至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的機械連帶 (mechanical solidarity) 和有機連帶 (organic solidarity) 也有演化或進步的涵義，雖然已經沒有像十八世紀的哲學家那樣有信心了。這種進步的信念以及對未來樂觀的展望，到了二十世紀逐漸受到了質疑，尤其是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在現代性的發展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後文會再加說明。

當代德國社會理論家哈伯馬斯 (J. Habermas) 以啓蒙方案 (Enlightenment Project) ——即啓蒙思想家爲人類的未來所擘畫的藍圖——來界定現代性，哈氏認爲此方案一直到當代還在繼續執行，尙未完成 (Habermas, 1981, 1983)。社會學家韋伯和涂爾幹也對「啓蒙」的理性都深信不疑，把它當作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個顯著特色。

2.1.10. 工業革命

十八世紀後期開始的工業革命一方面開始大量採用無生命的能源，以取代人力和獸力從事生產；另一方面是集合多數的工人在一個場所，從事生產活動，這是工廠制度的起源。英國是最先進行工業革命的國家，其因素有一些是和現代性有關者，值得在此一提：例如英國最早獎勵發明（1624年制訂專利法）及提倡科學研究（1660年設立皇家學會）、擁有廣大的殖民地，可獲得廉價的原料及廣大的市場；民主政治確立，私人資本可獲得保障，有利工商業的發展；商業發達，可累積資本供工業發展之用等等。

法國、比利時、普魯士、瑞典等一些歐洲國家，繼英國之後，也積極發展工業，不過這已是十九世紀中葉之後的事了。十九世紀後期，美國工業也急起直追，成爲英法的強勁對手。由於

每一個國家原來的政治經濟情況不一樣，加上先發展國家的壓力，因而面臨的問題不相同，發展的方式也有異。例如鐵路的發展，在英國是工業革命開始一段時間之後才大為發展，由私人經營，政府並沒有任何計畫。但在法國和比利時，有鑑於英國發展鐵路之後得到許多利益，於是政府決定主動而有計畫地修建鐵路，來促進其他工業的發展。

由此可見，歐洲各國工業化的道路不盡相同，過度的概推可能會抹煞重要的歷史差異。任何從「先進國家」概推而得，意圖應用到「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模式，都必須經得起歷史事實的考驗，否則可能流於學者的意識型態的虛構，或是窒礙難行，與當初的目標南轅北轍。

以上所概略指陳的事件都是與西方現代性關係最為密切的，可以說現代性就是由這些事件所形塑的，同時也包含了這些事件的成果和精神。茲表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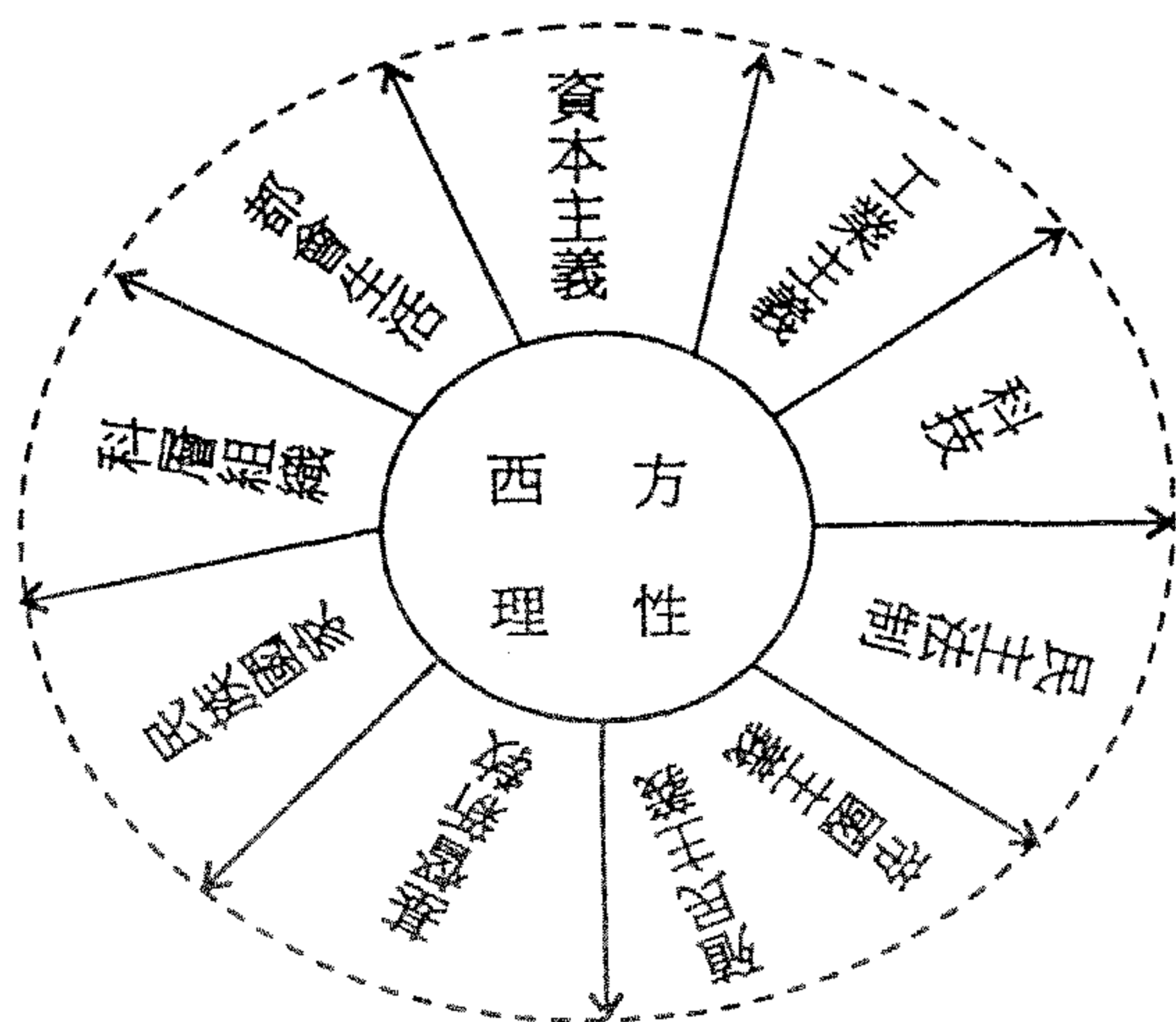
表一 西方現代性的歷史軌跡

西方現代性的形塑	城市的復興 (11-13 世紀)
	文藝復興運動 (14-15 c.)
	海外探險及殖民主義 (15-19 c.)
	資本主義 (14-20 c.)
	宗教改革 (16 c.)
	民族國家 (15-17 c.)
	民主革命 (17 c.)
	科學革命 (17 c.)
	啓蒙運動 (18 c.)
	工業革命 (18-19 c.)

理性主義是啓蒙運動的主要精神，哈伯馬斯所謂的「啓蒙方案」或「現代性方案」就是企圖把理性實現在生活的各個層面。對韋伯而言，現代化就是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這主要還是繼承了啓蒙運動強調「理性」的傳統。(Weber, 1946: 129-156; 1958: 13-31) 在涂爾幹思想中，理性也是現代性的主要特色，理性的科學方法也可以運用到社會文化（如分工、自殺、道德、宗教等等）的研究上。「理性」（或「西方理性」）可看作是現代性的一個核心要素，和現代性其他的要素都有所關聯。

以上謹就西方近代幾個歷史事件來看現代性的形塑，這是從縱貫面來看現代性發展的軌跡；若從橫剖面來看，則可看到現代性的要素或面相，茲以表二來表示之。

表二 西方現代性的要素或面相



「西方理性」與非理性之間其實有一種辯證或轉化的關係，這從科技發展的過程可以看得相當清楚。科技固然是西方理性之表現，在當代其極致卻表現在核子武器之擁有及其結果之核戰威脅上；工業生產固然是理性之表現，卻又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在此套用現任捷克總統及思想家哈維爾 (V. Havel) (1992: 132-135) 說過的話，現代科技想要控制或改造自然，到頭來卻摧毀了自然，想要控制環境，卻破壞了環境。從二次大戰以來，這種「理性」的非理性面或陰暗面越來越明顯。這可說是「西方理性」的弔詭。

從本文的觀點來看，民國初年五四運動所標榜的「民主」和「科學」無法涵括西方現代性的內涵；最近黃仁宇先生常說的「數目字的管理」更不能概括現代性的內涵。如上所述，現代性涉及文化、宗教、科技、政治、社會階級、經濟等等，很難一塊移植到另一社會去，這是第一層次的問題。第二層：如上所引「橘逾淮為枳」，即使部分能移植到另一社會，其結果或變化也很難預料，看看日本和台灣的所謂「民主政治」就是如此。第三層是應然的問題，即有些現代性的面向值不值得移植或取代已有的事物。最近新加坡的鞭刑成為國際輿論的話題，且被美國總統點名批判。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卻宣稱鞭刑對新加坡的治安和穩定有幫助，沒有廢除的必要。不過在這個事件中，新加坡在國際政治和輿論上面臨了極大的壓力。

本節主要是把現代性及現代化擺在西方（尤其是歐洲）的歷史脈絡裡來瞭解，以尋求瞭解現代性以及現代世界的性質和來龍去脈，並可藉此瞭解第三世界國家之處境及問題。因為現代性及現代世界的問題蘊涵著近代西方的興起及霸權以及西方與非西方的關係。西方的現代化和非西方現代化乃同一過程的不同階段，

而且是密切關聯的，非西方的現代化受西方現代化很大影響。不過此二者的影響關係主要並不是把西方現代化的經驗或「模式」，現成地拿到非西方社會來實行，以期建立像西方社會一樣的現代化社會；而是西方國家基於其階段性之現代化的經驗和成果，企圖擴張其勢力範圍，與非西方接觸並尋求貿易機會，並進而企圖征服及殖民化非西方社會，以獲取更大的利益。所以說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是西方／非西方關係中十分重要的環節，也是現代性從西方推展到全世界的一種重要形式。這是西方現代性問題之所以與非西方或第三世界相干的主要理由。

2.2. 全球現代性的發展

現代性是在西方所形成的，現代化最早也發生在西方，由於西方現代性的一些歷史要素如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甚至於基督教，都有向外擴張或散播的趨勢，甚至如韋伯所說的，隱含有主宰世界 (mastery of the world) 的意圖（或許這就是近代所謂「西方帝國主義」的因素），隨著西方勢力的擴張，現代性也傳播到其它地區，遂成爲世界史（而不僅是歐洲史）的一個範疇。現代性不再侷限於歐洲或西方，「現代世界」(modern world)（而不僅僅是現代諸社會 (modern societies)）逐漸形成了，而此現代世界的形塑及推廣是由西方強權所主導的。

2.2.1. 現代性的漩渦

在此，我們可以用一個模型來說明現代性和現代世界的形成。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現代性的漩渦」，發源於歐洲，而且在歐洲蘊釀、發展了幾個世紀，即上述的「西方現代性」的時期。隨著歐洲勢力向外擴張、征服的過程，此漩渦的範圍越來越大，

終於席捲了全世界。這個模型的一個重點是：非西方的社會及文明是在上述的過程中「被捲進」了現代性漩渦，而不是一個一開頭就自願接受的過程。近代非西方之社會及文明與西方交鋒時，非西方受到西方的挑戰或侵略，經過一番掙扎或抗拒（包括內部的爭議），最後才走上西化或現代化的路線。西方文明取得了獨霸世界的地位。這是文明之間衝突及順應的結果，並不是和平、理性的過程。沒有一個社會或文明是一遇到西方近代文明就自願放棄自己的文明，而全盤採納西方文明，幾乎都是為形勢所逼迫。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些非西方社會中的許多人主觀上還是有很大的疑懼及保留，如在中國有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在日本有所謂的「洋才和魂」等對西化作某種限制的論調。以下分別對幾個主要的非西方社會與西方的接觸作一個簡略的回顧，以闡明「現代性漩渦」的模型。

俄羅斯乃是最早進行現代化的一個非西方國家。這可能是由於斯拉夫與西方有共同的文化淵源，斯拉夫人在十世紀末就從東羅馬帝國正式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和當地的民間信仰混合，發展出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信仰，就是所謂希臘正教(Greek Orthodoxy)。隨著基督教而來的是整套的拜占庭式的儀節、典禮、藝術，且使用略為改造過的希臘字母來拼寫他們的語言，這些奠定了日後俄羅斯帝國的文化基礎。隨著歐洲的現代化，歐洲對於俄羅斯的優勢和威脅也越來越明顯。1610 波蘭挾其現代武裝力量的優勢，佔領了莫斯科達兩年之久。同時瑞典人也奪去了俄國位於芬蘭海灣口的波羅的海口岸。俄羅斯對於這些西方侵略行為的回應，就是進行徹底的西化或現代化，這主要是彼得大帝(1672-1725)的事業。在二十五年的期間，他發動了一系列涉及行政、工業、商業、軍事、科技、教育及文化的改革。到了十八世紀俄國

幾乎達到與西方齊頭並進的水平，而能擊敗 1709 年入侵的瑞典人和 1812 年入侵的法國人。由此而言，俄羅斯對西方之挑戰或衝擊的回應是相當成功的，甚至可以當作一個典範。

中國的例子來說，歐洲強權從十六世紀初（明朝）起開始侵入廣東沿海，先是葡萄牙，後有西班牙、荷蘭、俄國（沙俄）。不過在一八四〇年中英鴉片戰爭之前，一直遭到中國政府有效的抵抗，無法得逞。鴉片戰爭失敗後，西方首次以武力打開中國門戶，與英簽訂「南京條約」，開五口通商、割讓香港、賠款。1856～1860 年英法兩國在美俄的支持下，聯合發動一次新的侵華戰爭。這次戰敗損失慘重，與上述四國分別簽訂「天津條約」，進一步開放十個通商口岸，外國公使進駐北京，洋人可進入內地經商傳教，外國軍艦有權駛入長江和各個通商口岸。英法聯軍之後，清朝部分官員遂倡導「洋務運動」，以「自強」和「富國」為號召，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引進機器生產、派遣留學生等，以期「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之後清廷又和歐洲列強訂立北京條約（英法俄）、煙臺條約（中英）、中法合約、辛丑合約（八國聯軍）等等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幾乎淪為歐美強權（再加上日俄）的殖民地。由此而言，清朝（暫且不談民國以後）對西方挑戰的回應相當失敗。而中國之被迫開始進行西化或現代化也是很明顯的事。

從十六世紀中葉開始，就有歐洲人到日本通商及傳教，後因基督教與日本原有宗教如神道教、佛教等常起衝突，引起社會不安，遂開始閉關自守，史稱「鎖國時代」（1638～1853）。十九世紀中葉美國艦隊強行叩關，要求日本開港通商，閉關之局遂告結束。1858 年美日正式簽訂不平等條約，開放通商口岸、議定關稅，並允許美國人在日本享有領事裁判權等。後來俄、英、荷、

法援例，相繼與日本簽訂類似的的不平等條約。歐美勢力的侵入，也曾引起日本不少排外運動，但都遭歐美各國武力鎮壓下去。1868年明治天皇親政時，雖年僅十五歲，但他已知非變法無以圖存，遂開始推行新政，史稱「明治維新」。由此可知，日本的西化或現代化也是在歐美侵逼的情況下開始的。

早在十七世紀，英、荷、法、丹麥等國先後建立了東印度公司，競相建立商站。經過激烈的角逐，英國殖民者終於在十九世紀初併吞了印度。印度的西化或現代化（十九世紀上半葉）是在英國佔領之後由英國統治者強迫進行的，主要是配合英國的利益而進行的，並不是印度人自願的。在此過程中，印度傳統手工業被摧毀，農民陷於極端貧困狀況，印度成爲英國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市場。（註5）

再者，位在於此一現代性漩渦不同的位置，承受到衝擊的程度和方式因而有所不同，例如有些地區比較接近原始的核心區——歐洲，可能比較早接觸到現代性，有些地區距離核心區比較遙遠，比較邊緣。例如，如上所述，俄羅斯在彼得一世即位（1689年）以後就以西歐爲模式，在政治、財經、軍事、文化、教育和宗教等方面進行一系列的改革，也就是所謂的西化或現代化。又如印度也在大英帝國統治下，於十九世紀前三十年實行了政治、經濟、軍事的改革。相對而言，日本和中國進行現代化或西化都是比較晚的事（十九世紀下半葉，明治維新約始於1870年，百日維新1898年）。再者，這個大漩渦逐漸發展出若干個核心（或漩渦眼），除了原有的核心——西歐之外，美國、蘇俄、日本爾後也都分別形成了現代性的核心，分別帶動世界各個地區的現代化。這種多核心的現代世界的結構，造成了以色列社會學家埃森斯塔（S. N. Eisenstadt）所說的「多元的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

ties)。若從這一個觀點來看，到目前為止，「現代化」其實就是「西化」，都代表從十五世紀以來，隨著歐洲或西方勢力的擴張，而將現代歐洲社會文化的特徵（所謂「現代性」）傳播到世界其它地區去的一個過程或方式。所以現代性有它時空上的根源和侷限，現代化也不具有普世的價值。（註6）

2.2.2. 全球化和全球體系

如上所述，現代性的一些要素具有不斷向外累積、擴張的傾向，所以全球性(globality)應該可以看作是內存於現代性之中。而全球化也是現代化洪流中的一個趨勢。本世紀以來，此全球性愈益明顯。本文所謂的全球性可分兩個層次來理解，從客觀的層次而言，全球形成一個密切互動或交流的體系或單位，這不但在經濟上是如此（如華勒斯坦所論證的），在政治上、軍事上、生態上、資訊傳播上、以及文化上都是如此，這些層次可能會互相加強。（註7）其次從個人主觀的層次而言，個人從上述之客觀基礎上發展「全球意識」(global consciousness)，即意識到全世界或全人類為一個整體，甚至是一個命運共同體(a community of fate)。晚近之現代化中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就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亦即各國家或地區被整合到一個全球體系(global system)裡面的過程。全球化可設想為一種時空收縮(time-space convergence)的現象，地球好像變得比較小了，資訊傳播越來越迅速，變遷也越來越快，全人類好像生活在同一個空間或領域裡，科技的發展克服了空間的阻隔，誠如古語所說的「天涯若比鄰」。傳播學者麥克魯漢(McLuhan)用「地球村」，而羅伯森(Robertson)則用「地球城」(global unicity)來描述現代世界的這種情景(Robertson, 1992: 6)。「全球性」及「全球化」的另一面則是國際糾紛、衝突

增加了，全球範圍的支配或霸權現象出現了，現階段這一面似乎比較明顯，本文最後一節將會對此有所說明。上述的歷史發展可以圖示如下：

西方的現代性及現代化——→現代世界的形塑
 ——→第三世界的現代化——→全球體系的形成

「現代世界」乃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構成及世界觀，比較具有象徵意義；「全球體系」則指涉全球各地整合成爲一個相關互賴的體系，這是一個全方位的概念，包括經濟、政治、軍事、生態、傳播、文化等層面，也是一個比較描述性的概念。

依照華勒斯坦的研究，在十六世紀已經有一個歐洲的世界經濟體 (European world-economy) 存在，此經濟體的範圍當然是比全球的範圍小，不過也是超出歐洲範圍之外的一種分工體系。所以像巴西就是其中的一部分。(Wallerstein, 1974: 301) 從十六世紀起，隨著歐洲的工業發展以及對外的擴張（包括貿易及殖民統治），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逐漸形成。晚近關貿總協 (GATT) 的運作以及烏拉圭回合談判決議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都是經濟之全球性及全球化的表現。當前資本、人力、技術在國際間流動很頻繁，所謂的海外投資、外籍勞工以及技術合作乃今日各國常見的現象。例如，就目前全球最大的外資流入地中國大陸而言，一九九一、九二、九三三年間流入的外資分別爲一百一十億美元、二百四十億美元、二百七十億美元，三年共計流入六百二十億美元！而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至一九九三年已達一百二十八億美元，對東南亞的投資已達一百六十億美元。以上台灣對外投資的統計只限於經過政府核准者。由此可見資本全球化之一斑。

歐洲國家自十六世紀起競相實行殖民主義，據統計，一八一

五年時歐洲國家的殖民地佔全球土地的百分之三十五，到一次大戰前夕（一九一四年），這個比數增加為百分之八十五。英國佔有的殖民地更多達本國領土的125倍，成為橫行世界的「日不落國」。殖民地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紛紛獲得獨立，成為民族國家。前此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或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此後則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或國際的關係。一次世界大戰末所成立的國際聯盟，以及二次大戰後成立的聯合國，都是民族國家體系形成的重要里程碑。所以現代世界在政治層面上就形成了一個相當廣泛的民族國家體系 (a system of nation-states)，截至一九七一年為止聯合國會員國總數達132國，至九十年代已增至180餘國。這是為什麼我把二次大戰之後看作是現代性高度發展或全球現代性的階段的理由之一。

二次大戰還有一個分水嶺的意義。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九日美國先後在日本廣島和長崎各投下一顆原子彈，在廣島造成十四萬人死亡，在長崎則有七萬人死亡，日本人大感恐慌，因而無條件投降。此後美蘇核子武器競賽以及冷戰就成為威脅人類生存的隱憂。這標誌著現代性發展上的一個里程碑。軍事武力的秩序已足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甚至可能毀滅地球。換言之，已成為全球性的危機 (global crisis)。前此有些西方思想家所疾呼的現代性的危機大都是歐洲社會及文化的問題，不是全球性的。例如史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1880-1936) 說的「西方的沒落」，索羅金 (P. A. Sorokin) 說的「感性文化的危機」等等。核武的威脅可說是最典型的由科技之發展所造成的現代全球性的危機，如果套用德國學者貝克 (Ulrich Beck) 的概念，我們今日乃生活在一個「充滿風險的世界」 (Risk World)，此風險主要是來自人類自身科技的發明及發展，需要人類去共同面對、解決（參閱 Beck, 1992）。

世人有鑑於此，遂有美蘇裁減核武的長期談判以及不絕如縷的反核運動或和平運動。

軍事武力是一國國力很基本的要素，用以保衛自身的利益。軍事力量包括的元素有：人員、武器、訓練、組織等等。在高度工業化的時代，軍事也被高度工業化了，武器裝備精良與否就具有決定性的重要了。在波斯灣美伊戰爭期間，美軍以高度精良的武器（尤其是飛彈）輕易打敗了伊拉克，令人印象深刻。軍火工業的生產、銷售也成爲全球性的產業，有些國家（不限於西方高度工業化國家，例如中共、南非、以色列、捷克等）是以輸出軍火來賺取外匯，形成相當穩定的供需關係。目前現有最具殺傷力的武器就是核子武器，核武基本上是備而不用的，二次大戰之後就沒有再被使用過，尤其在敵對國家都擁有核武的情況下，那一方都不敢輕易使用核武。但是很多國家還是希望而且設法擁有核武，這是因爲一方面核武可以當作國際政治上的重要籌碼，二方面擁有核子武器被許多人認爲是一國國力和地位的一個指標，三方面擁有核武也被許多人認爲是國家獨立自主及安全感的保證。到目前爲止確定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有：美國、獨立國協、中共、英國、和法國五國；另外，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南非、南韓及北韓等國則是傳聞擁有核武，尙待進一步證實。核武的分佈不僅關乎全球的軍事秩序，而且和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

生態環境也是全球現代性的一個重要面向。今日的生態問題越來越具有全球性，雖然是在某一地點發生的，其影響卻很遠而且很快。在此可舉俄國車諾堡災變爲例，車諾堡是基輔附近的一座核電廠，1986年4月26日它的一座核能反應爐爆炸，當場炸死31人，輻射物隨著雲層的擴散，使得烏克蘭、俄羅斯的大部分地區都籠罩在高危險量的輻射之下。連東歐、西歐、北歐等地也受

到波及，農畜產品也受到污染。從這個個案裡面可以看到今日生態環境問題的全球關聯性。

因此從另一方面而言，今日生態問題的解決也必須聯合所有國家和地區，來共同謀求對策。只要部分國家或地區杯葛，甚至只是消極地不合作，就很難改善；例如臭氧層遭破壞的問題就需要全球各地合作解決，最近據報載此問題已漸趨緩和，也是國際合作解決的績效卓著。所以去年國際籌組召開蒙特婁地球高峰會議共謀生態問題的防制及解決之道。晚近國際環保組織傾向於運用種種方法來制裁不合作的國家，因為他們瞭解這是全球性的問題，必須聯合採取一致的行動才能解決。生態問題的發生固然是在某一個國家或地區裡面，其影響卻常常是全球性的，其解決因而也必須是全球性的。今日生態問題的全球化極為明顯，不待辭費。

傳播科技是今日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動力，也是全球現代性的一個重要面向。例如透過衛星轉播，今日的電視通訊可說是無遠弗屆、超越了國界，而且可以同步轉播。大陸天安門事件和俄國的政變發生之後幾個小時，就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這不能不歸功於現代的傳播科技，克服了空間的阻隔以及時間的延宕，使時空大大地縮小了。

隨著傳播科技以及移民、旅遊、貿易、留學等活動，文化交流大大增加了，有些文化內容或象徵也隨之傳播到全球，例如法語、英語、美語、美國好萊塢出品的電影及電視影片、可口可樂、美國速食文化、基督教等等；相對而言，其他文化也跑到美國來，如日本汽車、日本和中國的武術、中國餐館、佛教（尤其是禪）等等。雖然我們目前無法斷定未來是否會有一個共同的世界文化的出現，不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採借或涵化的確已達

空前的程度。相對而言，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間的衝突事件也越來越頻繁，就以最近十年來說，中東（以、阿）問題、美國與中東回教國家的糾紛、美國與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中共）關於人權的爭議、美國與新加坡關於鞭刑的爭執等等只是比較顯著的例子而已。

全球現代性 的重要面向	世界經濟分工
	民族—國家體系
	全球軍事秩序
	全球生態體系
	國際資訊傳播秩序
	國際文化交流

3. 霸權與現代世界

上述由西方現代性發展到全球現代性，以及全球化的發展，並不是要描述一種烏托邦或者世界大同的情景；在本文中，全球性或全球化只是當作現代性發展的一種趨勢，即全世界在幾個重要的層面上逐漸整合為單一的互動體系，我們稱之為「全球體系」。在全球體系的各個層面上的互動增加了，互動一方面包括合作、交流、聯盟，另一方面也包括衝突、宰制、剝削等。後者在當前尤其重要，本節旨在指陳此一現象。

在全球體系各個重要層面上都有霸權或政治因素的存在和運作，因而有強勢與弱勢、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等不平等的區分。例如華勒斯坦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分為三種地區——核心、邊

陞、半邊陞，雖然是按世界經濟中的分工來區分的，同時也是一種權力和利益的階層化。例如最近 GATT 的烏拉圭回合談判，在一片慶功叫好聲中，我們仍發現該項協定所帶來的利益分配很不均等。據估計各地區獲利概況如下：

歐體國家	\$610 億
美國	\$360 億
日本	\$270 億
前蘇聯集團國家	\$370 億
第三世界國家	\$160 億
(以下略)	

由此可見，歐美日蘇仍然是主要的獲利國，尤其是美國主導這次談判，儼然成爲世界經貿盟主。歐體也是這次談判的主角，佔關鍵性的地位。區域性的貿易組織——美國主導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太經合會 (APEC)、歐體、及東協——成爲這次談判的籌碼，並提供成員國經貿談判及聯盟的經驗，可說是這次全球性的經貿整合的重要基礎。世界體系是一個爭權奪利的場合，那個國家權力大或影響力大，那國就能分得比較多的利益。不能把國際社會想成權力真空，每一個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都能按照發展指標或現代化模式，獨立自主地發展，沒有強權的干預，沒有世界體系的強迫分工。

全球體系的其它層面同樣有霸權的存在和運作。在生態體系上，歐美國家（如華盛頓公約組織 (CITES)）或有關的民間組織也在「普世利益」(universal interest) 的名義底下，以「世界警察」的姿態出現，利用各種手段來干預或監督各國的生態環保政策及其執行。「世界」保育組織以相當強烈手段干預台灣使用犀牛角

和虎骨的事件似乎涉及中西文化差異，他們對於異文化缺乏同情的瞭解及尊重，卻橫加干涉，充分顯示「西方中心主義」的心態，以及霸道的行爲。

在資訊傳播上，西方自由主義者以「國際資訊傳播的自由流通」以及自由市場爲理由，反對各國對資訊傳播作任何的管制措施，結果歐美資訊大量流入第三世界，形成一種「單向傳播」。有人稱之爲「媒體帝國主義」。（李金銓，民八二：253-288）例如在蘇聯、東歐共黨政權崩潰前，「全球四大通訊社——美聯社、合衆國際社、路透社與法新社，控制了共黨世界以外四分之三以上的新聞發佈與新聞流通，提供全球數十億人有關國際的消息與資訊。」（彭芸，民八二：302）四大通訊社當初就是爲了歐美國家統治其殖民地而建立的新聞網絡，故可稱之爲「殖民地時代的遺產」。如今殖民時代早已過去，此遺產仍然支配著第三世界的新聞傳播。除了新聞之外，歐美的廣播、電影、電視節目、報紙、雜誌等也大量流入第三世界。這些現象一方面是資訊全球化的一個證據，另一方面也證明國際媒體霸權的存在，這種現象是否會造成「新殖民主義」或者思想文化上的殖民主義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同理，也有所謂的「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意即在文化交流上嚴重失衡，甚至只有單向交流。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或「文明政治」（politics of civilizations）的現象，即文化領域內的權力宰制、衝突、聯合、妥協等現象，包括各大文明之間的衝突、交流、採借等關係。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93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發表了一篇引人矚目的文章〈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主張今後文明的

衝突將取代意識型態的衝突、經濟衝突，成爲未來國際政治鬥爭的主線，並提出西方世界要防範儒家與伊斯蘭兩大文明聯合起來(Huntington, 1993)。(註8)

由於國際上霸權的流行，使得上述所謂的「全球民主」或「國際民主」似乎只是個烏托邦。聯合國大會裡的一國一票只是民主的表象而已，大國實際上仍然主導著國際局勢。「常任理事國」的設置就是對國際現實的一種妥協，不符合民主原則。

結 語

本文用一個漩渦模型來闡明現代性。「現代性的漩渦」最早發源於歐洲，由於現代性的積累、擴張的特質（和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的性質相對應）以及歐洲人的活動，此漩渦越捲越大，先是波及非洲、美洲，繼而波及印度、東南亞、中國、日本，終於席捲全世界。現代性漩渦在歐洲發源以及早期發展的階段，本文稱之爲「西方現代性」；此漩渦席捲全世界後，本文稱之爲「全球現代性」，一方面代表現代性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則顯示全球性及全球化已發展成爲今日之現代性的顯著面向了。這是現代性高度發展的時期。由於全球化的發展，全球已經形成了某種的體系或秩序了。到目前爲止，這已經是一個「現代世界」了，此現代世界的形成過程即現代化。全球化也是現代化的一部分。絕大多數的國家或地區都自願地或被迫地整合到此「現代世界秩序」，例如今日我們在台灣不配合西方保護稀有動物也是不行，不保障台灣民衆的基本人權也是不行，在經濟方面不自由化國際化也不行。中共的人權則承受著西方國家極大的壓力，新加坡的鞭刑也是如此。此整合到「現代世界」的過程也就

是各個地區和國家現代化的過程。基本上現代世界乃由西方強權所形塑及主導的秩序，其遊戲規則也是西方強權所制訂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現代化其實就是西化。東南亞地區近年偶有所謂「要現代化而不要西化」的呼聲（例如李光耀），這是不可能的，不過必須配合西方霸權的消退，以及非西方政經力量的增強，以達到比較平等的世界秩序。這一方面固然還是要繼續向西方學習。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間的學習永遠是有必要的，並不是西方今天主導了全世界，我們才向他們學習；另一方面，上述的呼聲可以理解為一種本土化的自覺和趨勢，亦即重視本國或本地的需要和文化或者其它的特殊性，而不再事事以西方之馬首是瞻。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間會有一種張力，到底是強調本土 (the local) 的需要或特殊性，還是強調國際的標準或要求。經常表現在洋土之爭上。未來隨著西方與非西方勢力的消長，以及隨著非西方民衆的自覺和爭取，可預見的是本土化的趨勢將越來越強，前述的張力也將越來越明顯，而將會表現在西方和非西方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衝突。或許從這裡（即全球化與本土化的辯證或張力）可以看出「後現代」的端倪。這是站在本文的立場上所作的一點展望，也是另文的主題。

註釋

註1：現代化理論的論述對象主要是第三世界或開發中國家，具有實用的意圖，所以它的三個構成部分是：(一)進步觀(二)傳統和現代的劃分，有時也加上中間或過渡的階段或社會類型(三)現代化的計畫 (programme) (Gurnah and Scott, 1992: 133)。而晚近（尤其是1980年代以後）討論現代性其脈絡主要是西方世界，檢討西方現代性的形成和性格或內涵。

註2：在本文中，「現代」和「近代」的意義相同，都與 "modern" 相對應，視脈絡而交替使用。

註3：從歷史上來看，在西方／非西方的關係裡頭，殖民主義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在非西方的現代化過程裡，殖民化也是重要的一環。一些非西方國家或地區，在其歷史上的某段時期，現代化就是殖民化，例如英國統治下的印度、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等，荷蘭、西班牙、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荷蘭統治下的印尼，美、西統治下的菲律賓等等。這當然不是由於殖民者的仁慈，而是殖民統治的一種政策——即「養雞生蛋」或「種樹伐木」。此種政策經常比「殺雞取卵」或掠奪式的經濟替殖民者獲取更多的利益。殖民者壓榨、掠奪被殖民者以及大量屠殺被殖民者的事蹟可說是罄竹難書。這是西方現代性的開展和擴張的歷史過程，或「現代世界」的形成過程的一個構成部分。換言之，也是世界現代化的一部分。

註4：中國人於十一世紀開始使用羅盤，十四世紀已擁有「四層甲板的大帆船，船身分隔成幾個密封艙，配備四至六根桅杆，可張十二蓬帆和運載一千來人」（引自布羅代爾，1992：480）。十五世紀中國船隊在鄭和率領下完成多次的遠航，到達阿拉伯以及東非的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另一說是木骨都束（Mogadishu）（張彬村，民八十：48；陳信雄，民八十：156），這是中國遠洋航行的頂峰，可惜後繼無人，不能繞過好望角，向非洲西岸和歐洲探航。據西方學者的觀察，中國人「害怕大海，不習慣遠航」、「善於近海航行，不善於遠洋航行」（同上引：484-85）。日本人也有類似的傾向。布羅代爾（F. Braudel）則認為中、日航海業與歐洲之所以有如此的差異，並非技術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西方資本主義城市的擴張所導致的需求，以及西方人的激情——敢於冒險。（同上引：485-86）另外也和當時政府的態度有關，日本江戶幕府實行「鎖國政策」，明、清政府時有「海禁政策」之施行，或起碼不鼓勵遠洋貿易。而十五世紀起，葡、西政府就有鼓勵支持遠洋探航活動之舉，哥倫布和麥哲倫都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支持。布羅代爾指陳的西方社會經濟發展上的需求是很關鍵的，不但支持海外探險，而且支持海外殖民，由此而回饋國內的社經發展。

註5：漩渦模型蘊涵了外來者的挑戰迫使某些社會採取類似方式的應變措施。這和史學家麥克尼爾（W. H. McNeill）研究世界文明史的結論若合符節。麥氏巨著《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有一個基本假定，即與擁有新技術的外來者接觸是人類歷史上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從此一假定可以做一簡單的推論，即世界史家關注的重點應該在同時期各文明間的互動（McNeill, 1991: 48）。世界霸權的遞嬗也和新技術的採

借有密切的關係。根據麥氏的研究，世界史各階段的霸主可陳示如下：希臘文明 (500 B.C.--A.D.200)，印度文明 (A.D.200--600)，中東回教文明 (A.D.600--1000)，中國文明 (1000--1500)，以及歐美文明 (1500--2000)，例如歐美文明從中國採借羅盤、印刷術、火藥等，中國文明從中東借取遠距離的貿易運輸系統（包括駱駝隊商），當代的日本從歐美借取先進技術。（同上引：53-64）

註6：現代化另外一種經常被蘊涵的模型是「賽跑的模型」（跨欄賽），此模型乃本文所提出之「漩渦模型」的一個對立模型。「賽跑的模型」首先，要不要參賽應該是基於個人的意願或決定，不應有外力的強迫。其次，所有競賽者分據不同的跑道，但沿同一路線競賽，快慢端視各人的腳力，互不干擾。所有競賽者都必需超越同樣多個柵欄，雖然有先後到達之分（這是賽跑最重要的），最後的目的地都是一樣的。與此類似的，現在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好像是在現代化道路上競賽，要不要加入全憑各國的意願或決定。歐美國家是先進者，其它國家則是後來者，各國各自憑其內在的動力及互相採借（尤其是後來者借鏡先進者的經驗，因為他們都是同一條道路上發展）而向前發展，也許有一天這些嚮往現代化的國家都能達到「現代社會」的境界，各方面都像現在歐美先進國家那樣。雖然我們發覺到目前為止，很少有「趕上歐美的」（日本經濟是一個例子），可是根據這個模型，許多人還是相信這是公正的競賽，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趕上甚至超越別人。賽跑模型蘊涵一種自由主義的觀念 (liberal implication)，意即參不參加競賽悉聽尊便，沒有誰能勉強誰。起碼非西方許多國家的現代化經驗與此不符。

註7：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在此處是相干的。依華勒斯坦之意，資本主義自從十五世紀在歐洲發展以來，已經在全世界的範圍形成了一個分工的體系，他稱之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capitalist world-economy)。華氏主張從全世界的範圍來界定資本主義，把分析單位鎖定在「世界體系」上，是很有啓發性的論點。這和他從全世界的範圍來理解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他的「世界體系」與本文的「全球體系」有些關聯，雖然是不同的兩個概念（後詳）。不過從本文的觀點來看，華氏學說（尤其是早期的）也有不足之處。他的理論誠如他的用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所顯示的，是處理經濟層面的問題，所以他說的「世界體系」，確切而言，乃「世界經濟體系」或「世界分工體系」。他把經濟或資本主義當作現代世界變遷唯一重要的因素。換言之，他的理論架構主要是單一層面的、或單一邏輯的。忽略了諸如民族國家

(nation-states)、工業革命、傳播科技、軍事擴張、生態環境等導致的問題，及其對現代世界變遷的影響。（參閱 Giddens, 1990: 67-69）

註 8：從文明的角度來看世界事務或世界史，在西方思想界已有脈絡可尋。二次大戰後德國思想家史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發表他的鉅著《西方的沒落》，其後英國史學家湯恩比 (A. J. Toynbee) 撰寫的《歷史研究》，以及美國歷史學者麥克尼爾出版的《西方的興起》都是以文明為他們的研究單位。這裡所說的「文明」即亨廷頓界定的「文明是人類文化最高層次的組合，也是人類文化認同的最廣領域」(Huntington, 1993: 24)。再者，亨廷頓的文章一方面稍嫌誇張了文化或文明認同的分量，其實國家認同、種族認同、性別認同、階級認同以及家族認同在現代世界都還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該文幾乎完全沒提到文化交流、融合的面向，從亨廷頓的論述來看，文明好像是一個個無法互相滲透、交流的單元，而只是互相敵對戰鬥的單元。在歷史上各文明之間的交流、採借以及融合對於各文明的發展都曾發生很大的影響，如中國文化東傳日本、佛教傳入中國，或者近代許多文明的西化都是顯著的例子。除了上述的保留意見之外，我倒是相當贊同亨廷頓說的文化或文明的因素在國際政治上或在全球事務上有越來越重要的趨勢，這從近年國際上所發生的一些議題，如上文提到的中東（以、阿）問題、美國與中東回教國家的糾紛、美國與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中共）關於人權的爭議、美國與新加坡關於鞭刑的爭執等等，都可以發現。

參考書目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rman, Marshall

1983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London: Verso.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urnah, A. and A. Scott

1992 *The Uncertain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Hall, S. and B. Gieben (eds.)

1992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Open University & Polity Press.

- Held, David (ed.)
1993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Cosmopolitan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1991 "Democracy's Third Wave." *Journal of Democracy*, 2:27, Spring.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3, Summer.
- Kumar, K.
1978 *Prophecy and Progress*,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 Marx, Karl and David McLellan (ed.)
1976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77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Lellan, David
1980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McNeill, W. H.
1965 *The Rise of the West*, New York: Mentor Book.
- Ritzer, George
1988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 Robertson, Roland
1992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Weber, Max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Weiner, Myron (ed.)
1966 *Moder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Growth*, Voice of America Forum Lectures.
- 布羅代爾 (F. Braudel) 著，顧良等譯
1992 《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
台北：三聯。

McNeill, H. William

1991 〈世界史的一個新結構〉，邢義田譯，《當代》no.66。

黃仁宇

1991 《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台北：聯經。

馬克思

1975 《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金銓

1993 《大眾傳播理論》。台北：三民。

彭芸

1993 〈國際資訊新秩序〉，刊載於上引李金銓《大眾傳播理論》，pp.301-310，台北：三民。

柯志明

1986 〈伊曼紐·華勒斯坦訪問錄〉，《當代》，no.4。

邢義田

1987 《西洋古代史參考資料（一）》。台北：聯經。

1991 〈面對新世界〉，《當代》，no.66。

Sombart, W.

1991 《現代資本主義（第一卷）》1。季子譯。台北：上海商務。

福武直

1985 《日本的社會結構》。王世雄譯。台北：東大。

湯恩比

1990 《文明經受著考驗》。沈輝等譯。台北：遠流。

哈維爾

1992 《哈維爾選集》。台北：基進出版社。

張彬村

1991 〈明清兩朝的海外貿易政策：閉關自守？〉，《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四集），pp.45-59，中研院社科所，台北：南港。

陳信雄

1991 〈唐代中國與非洲的關係〉，《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四集），pp.125-159，中研院社科所，台北：南港。

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Ruey-chyi HWANG*

(ABSTRACT)

Historically speaking, Modernity refers to the nature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centered on Western Rationality and included Capitalism, Industrialism, technology, democracy, colonialism etc.. Modernity originated from Southern Europe in late Middle Age. From then on Modernity diffused to the whole Europe, then with the expansion of Western powers Modernity diffused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the early stage we called "Western Modernity", at the latter stage we call "Global Modernity". We may think the diffusion of Modernity as a maelstrom. The core of the Modernity Maelstrom is in Europe, the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maelstrom. This process we call "Modernization". The result of the process is the Modern World which is dominated by Western powers.

keywords: modernity, modernization, western rationality, western modernity, global modernity, Modern World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